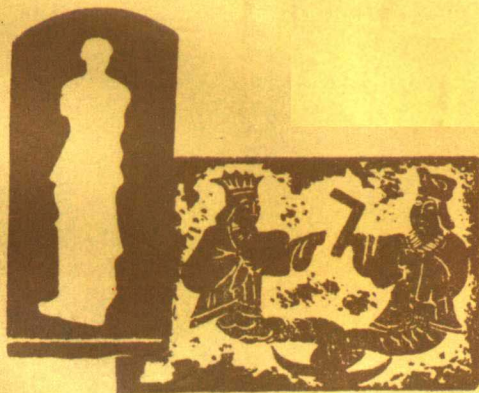


蘇洲雷文集



第二卷

苏春生 房鑫亮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蘇淵雷文集

九三寔
顧廷龍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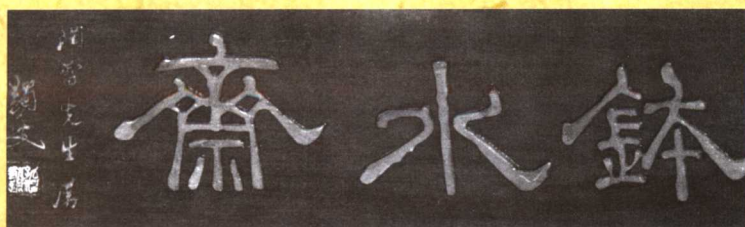
第二卷

苏春生

房鑫亮

主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苏渊雷先生八十年代摄于钵水斋家中



苏渊雷先生吟诵诗作



苏渊雷先生与日本著名书法家村上三岛一九八七年摄于大阪

净观

苏渊雷



苏渊雷先生草书

第 二 卷

著 作(二)

目 录

白居易传论.....	557
读史举要.....	641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915

白居易传论*

* 本书 1956 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初版。

目 次

导论	560
一、中国的诗歌传统	560
二、中唐的社会面貌	563
白居易的家世	567
一、世系与出身	567
二、新兴士族的进步性	569
白居易的生平	572
一、不平凡的少年	572
二、尖锐的政治斗争	573
三、天涯沦落之感	576
四、逃避现实的隐退生活	581
白居易的思想及其性格	583
一、艺术与政治相结合	583
二、文艺论	586
三、政治上与文艺上二重性思想的斗争	588
白居易诗的分析(上)	591
一、继往开来	591
二、美刺比兴的风格	597
三、社会现实的内容	600
白居易诗的分析(中)	605
一、“流丽”与“曲尽”	605
二、逻辑的力量	609

三、洋溢的同情·····	612
白居易诗的分析(下)·····	614
一、创作方向的明确·····	614
二、文艺批评的重视·····	618
三、风格体制的形成·····	622
白居易诗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	628
一、对当时诸家的影响·····	628
二、对后世诸家的影响·····	631
三、对国外文学的影响·····	633
诗人白居易的新评价·····	635
白居易诗文集版本目录·····	638
后记·····	640

导 论

一、中国的诗歌传统

远从未有文字记载的时代起，诗歌这一艺术形式，早就为世界上广大劳动人民所爱好，口耳相传，用来反映现实、抒发情感，而达到对生活的鼓舞、反映、团结和批评的作用了。等到用文字记录下来，单就中国诗歌发展史来说，也已有三千四五百年的历史，它在劳动人民整个生活过程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不管樵夫(山歌)、船父(棹歌)、农民(秧歌)、牧人(牧歌)、织工(布谣)、茶女(茶歌)，他们都能在劳动生活过程中，很自然地运用有节奏的长歌短叹，组成一定的形式，用以抒发哀乐的情感、传达生活的愿望、提高劳动的兴趣；推而至于君相、贵姬、祭司(巫覡)、使节(行人)，以及旷男怨女、流人迁客，也都曾借用诗歌这一形式来表现自己、感染他人。至于舆人之诵，里巷讴歌，古代传记中尤不乏生动的例子。

二千多年前，经过史官太师之属编纂而流传下来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中几乎大部分出于劳动人民的口手，这正是中国，也是全世界最古典、最完美的诗歌宝库之一。它广泛地记录下当时不同区域、不同阶层劳动人民韵律生活最生动的表现，奠定了中国诗歌最基本的民族形式，指出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宽广道路。

通过《诗经》的研究，显示着古代的诗歌研究者对于诗歌的起源、作用、内容和表现方法各方面，已有天才的概括。

就起源说，诗歌首先是产生自劳动过程中的，也可以视作感

情社会化的产物。《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司马迁：“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朱熹：“人生而静，感物而动……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韵节奏而不能已焉。”这些都是很精辟的见解。

诗歌是一种通过韵律和词藻来批判现实、反映生活的武器。《论语》：“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道出了诗歌的作用。

就它的内容来说，可分为“风”、“雅”、“颂”三类型。风似民谣，大体是抒情诗；雅似乐府歌辞，大体是叙事诗；颂似舞曲或脚本，歌而兼舞，用于宗庙祭祀或其他庄严的典礼。

就它的表现方法来说，诗歌同时可采用“赋”（铺陈）、“比”（比喻）、“兴”（感兴）三种形式，给予后代作家以很大的影响。说到铺陈多采可举“词赋”为例，说到比喻丰富可举“楚骚”为例，至于感兴的优美，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古诗十九首》、《咏怀》之类的佳作。

上述内容和形式——风、雅、颂、赋、比、兴，就是中国文学史上所盛称的“六义”，即诗歌的六种规范，它标志出中国诗歌最早的传统，成为历代诗人们创作和批评的一定准绳。

随着古代阶级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劳动人民生活被压迫的呼声，越来越激切，到处散发不满的情绪，“变风”、“变雅”时代，诗人们一变温柔敦厚的情调，唱起“上帝板板”、“何草不黄”的反抗句子来了。美刺比兴的作用，越发显得重要。

这样，现实性和斗争性便构成中国诗歌优良传统的主流。

到了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到江汉流域，屈、宋一派的南方文学所谓楚骚便应运而生。合《国风》的抒情和《小雅》的讽刺，以《离骚》为代表，于是中国第一大诗人屈原，用特有的芬芳皎洁的风格，写出缠绵悱恻的性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

生之多艰”，发抒他那对祖国对人民热烈的爱，和对暴秦的无比的憎恨。

那种对未来理想的憧憬和对现实人生之悲哀的绝唱（实即对生命极端的肯定），以及象征的、优美的格调，悯物伤悲的怀抱，又构成中国诗歌优良传统的另一面。

下来，汉魏古乐府则以一种新姿态出现，继承《风》《骚》的遗响，采取民间的形式。《古诗十九首》隐约着时代的苦闷，曹氏父子苍凉激越的歌行，建安诗人嗟乱伤时的篇什，一方面表现出与外族接触后要求中原大一统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功业意气的飞扬，蕴有一种独立苍茫向宇宙“无限”向往的气概；同时，正是封建军阀集团兼并杀伐下，生民涂炭灵魂动荡的深刻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感受、儿女英雄的生动描写，却为乐府歌诗开辟出一种回肠荡气、一唱三叹的新境界。这又是中国诗歌优良传统的一面。

初唐一统，人民获得了暂时将息，外来文化及其生活形式，如西凉一系的音乐舞蹈等便源源输入，后期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渐趋发展成熟的高峰，而民间的文学艺术水平也已达到一定程度；陈子昂、张九龄、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先后应世，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诗人们上承《三百篇》美刺比兴的诗教，楚骚一派芬芳悱恻的风格，下采汉魏乐府古诗的徘徊情调与长短句法，于是以李杜为旗帜，一面揭出革命的浪漫主义，同时运用批判的现实主义，六朝以来绮靡不足珍的沉沉诗国，就放出万丈的光芒来了。

总之，对于当时庸俗、淫靡、纷乱的政治、艺术和社会风气，诗人们连连发出警戒和战斗的呼声，这正是时代转换的号角。从此，一派悲天悯人、感激豪宕的气氛，弥漫着整个诗坛而蔚成时代精神，渗入了灵魂深处。中唐诗人白居易苍头突起，恰恰是这伟大的苦难时代的一面镜子和一位天才的歌手，是批判地接受

文学优良传统的典型人物之一；又是忠实于生活的多彩、多产的新诗人！

二、中唐的社会面貌

唐自安史乱后，从天宝十四载到元和十五年（公元755—820年），六十多年间，由于地方军阀割据，形成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朝廷”和藩镇间长期的战争。各个政权尽量向人民榨取财物，黄河流域关陇河湟一带遭受极大的破坏，全国经济重心渐渐移到江淮流域。由于江淮一带物力（粟、布）的支持，封建的李唐政府，虽然国都长安屡陷，还能收拾破碎河山，暂时获得小康的局面。但是封建王朝盛极而衰的迹象，到了元和长庆时代，已经暴露无遗了。

（一）均田制坏，财政紊乱。北魏以来，赖以解决农民与土地矛盾问题的均田制，曾经取得一时的成绩。唐承隋制，实行均田：改定男子十八岁以上的，每人得田一顷（一百亩），年老的残废的得田四十亩，寡妇三十亩。十八岁以上男子所得田地中百分之二十为永业田，子孙可以继承享有，亦可自由买卖，其余百分之八十为口分田，如果失去劳动力，即由国家收回，重新分配。当时的赋税是每丁每年交粟二石，称为“租”；此外随乡所出，每年交绢或绫或缣各二丈、丝绵三两或麻三斤，称为“调”；另外“成丁”（原为二十一岁，后改为二十二岁，又改为二十三岁），每年要替国家服役二十天，如遇闰年加两天，不能应役可改用绢折代，每天折绢三尺，二十天共折绢六丈，此称为“庸”。这就是中唐以前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大概。

安史乱后，人口流动性很大，天下户册大半散失残缺，均田制既无实施的依据，而与之相应的租调庸税制也无法实行。到了德宗时代，就用宰相杨炎的办法，改为两税法：不问主户客户，只按财产多寡订出等第高下，每年夏秋两季征税，夏税不能超过六

月，秋税不能超过十一月。但两税法实行后流弊很多：因为它规定收一部分的现钱，当时钱币不多，而农民只有实物，税收时官方执行法令，农民只好用贱价卖出实物，商人和地主又趁机大放高利贷盘剥农民，因此人民大吃其亏，小农经济益发无法维持。农民穷困到极点，只好把仅有的土地卖光，又不得不租入地主的田地来耕种，致遭受两重剥削；有的因丧失土地，卖身投靠官僚地主家中为奴隶。李绅诗中所谓“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情况，就是这样造成的。

(二) 军费浩繁，苛杂扰民。天宝元年国内有州三百二十一，国外有羁縻州(朝贡国)八百；边境置十个节度使，配备边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余匹。单是衣食两项，每年就用去布帛一百二十万匹，粮一百九十万斛。内地驍骑(宫禁宿卫)等兵八万余人，还不计算在内。每年要支出这样巨额军费，怎能不加紧搜括以资应付呢？加以宫廷奢侈，任意挥霍，如“变造法”将全国各州县正仓义仓存粟，变价购买各地轻货输送京师，以利贵族浪费。皇帝个人尤多方聚敛，刻剥百姓，号为“进奉”以实内库；有所谓“助军”、“贺礼”、“助赏”种种名目；至使宦官率“白望”(在上市上瞭望，白取货物不付本价)数百人，在东西两市讹诈货物，称为“宫市”。人民更是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中唐以后，封建制度社会已到了烂熟程度，阶级矛盾日趋严重，几乎整个社会上自皇帝下至僧道，都是剥削寄生阶级，掠夺榨取，习以为常，据当时宰相李吉甫奏称：天宝以来，国家养兵八十余万，其余官吏商贾僧道不耕而食的占人口十分之五六，强制三个劳筋苦骨的农民，供养七个待衣坐食的游手。真是慨乎其言之了。人民除担负额定的赋税外，还有许多额外的负担，如“间架税”即房屋税，“除陌钱”即公私付款及买卖成交时的佣钱，巧立名目不一而足。

至于“和籴”，原是收购农产品充足军粮的一种办法，后来竟

至不问年成丰歉，一律摊购强买，使农民普遍破产。诚如白居易亲身体验过，在《长庆集·论和籴状》里所说：

凡曰和籴，则官出钱，人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也。比来和籴，事则不然。但令府县散配户人，促立程限，严加征催；苟有稽迟，则被追捉，迫蹙鞭撻，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人。若有司出钱，开场自籴，比于时价稍有优饶，利之诱人，人必情愿。臣久处村间，曾为和籴之户，亲被追蹙，实不堪命。臣近为畿尉，曾领和籴之司，亲自鞭撻，所不忍睹。

可见当时收购农产品政策的流弊了。

（三）经济制度上既如此不合理，而集中表现于政治上又是怎样呢？

中央与地方间的内战。最大的是安禄山、史思明两次入侵，虽然表面上发动于防边的胡将，实系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体现为地方觊觎中央政权的内战，前后凡九年（天宝十四载至永泰元年），国力从此大为削弱。加以回纥、吐蕃乘虚相继侵入，政府更不敢激起内变，动摇残局；对于拥兵悍将，一味采取姑息政策，但求名义上还承认“朝廷”，也就任他们占据土地、各自为政，至于封赏官爵、厚给财物，更在所不计了。各地节度使至互结婚姻，遥为声援，收集安史残部，练兵修城，任命文武官吏，扣留赋税，造成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长期对抗的局面。

华族与外族间的侵战。初唐挟统一中原的余力，对外侵略，辟地极广。中唐国内分裂，国防废弛，外族遂乘机侵入，北西南三边沦陷，一时无法恢复，乃借外兵从事内战，苟求胜利，以巩固其统治权；甚或多嫁公主给外族，号称“和番公主”，中原虚实尽为外族洞悉，益被轻视，中外华夷势力的升降更觉悬殊了。

那时劲敌，北方有回纥，西方有吐蕃，南方有南诏，先后来侵，国都长安屡陷，至被焚掠一空。南诏一役，中国死伤二十余万